

二十一世纪宗教的未来*

The Future of Relig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英] 唐·库比特著 王志成 思 竹译

Don Cupitt United Kingdom

[英文提要]

With the secular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we need a new world religion to arrest the destructiv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xt of a post-modern world, it is wishful thinking to imagine that traditional religion could survive and persist. Traditional religion ought to accept modernity, redefine itself, and embark upon an aesthetic makeover. For this purpose, what we need is to build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religio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ocus of this new world religion should be to present a new approach to experiencing and realizing our self and the common experiences and relationships we share in the world.

本书概述的是关于宗教意义之历史和未来的一种理论。我写此书是为了回应已经支配我的生活也许也已支配你的生活的重大的文化事件——人类意识的革命性转变以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发生的宗教意义的崩溃。

* 译文选自 Don Cupitt, *After God* (Basic Books, 1997) 导论和第十八章。

1952年我离开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几周内我就皈依了基督教,并正好在7年后被任命为英国圣公会牧师。

人们都记得,20世纪50年代是主流的传统宗教意识和民族身份相当自信和安全的最后几年。一个人的成长,所选择的不是做基督徒就是做人道主义者。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一种充满战斗性的、受抵制的、现代化的、无神论的人道主义,还有一种提倡彻底规划社会的、功利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完全没有灵魂的。对整整一代英国人来说,似乎很清楚的是,我们应该选择自由的特利党和国教会,正像欧洲大陆的国家投票拥护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美国满足于艾森豪威尔的领导那样。

当时我们意识到对宗教主要的思想挑战是和像弗洛伊德、萨特、罗素、艾耶尔这样一些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曾听到并谈论实证原则,这一原则断言信念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们经受得起经验的检验,但我们并不十分惊慌失措,因为我们的宗教意识非常强烈。上帝、恩典、永生,以及一个人的不朽灵魂对我们都是完全真实的。我们以一种赏识感阅读神秘主义者,尤其14世纪神秘主义者的作品。那也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真实感受。

但是,改变所有这一切的革命性力量已经活跃起来。第一个就是廉价的大众旅行和大量的经济迁移。由于政治家们清除了昔日的殖民帝国,欧洲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吸引大量移民,他们来自加勒比海、非洲和亚洲,他们使得西方各国变成多种族、多信仰的国家,并让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宗教与语言和文化身份的密切联系。真正的单一文化国家现在完全是例外。在多文化国家,宗教绝非总是一种促进国内和平的力量。相反,人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战争都是内战,而宗教分歧在大多数冲突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力量是业已开始的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变，引导者是传媒和令人捉摸不定的时尚行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思想的兴趣（如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中）正转向语言、沟通、表现、包装、信号、时尚、图像和符号交换。奇怪的是，在以前的宗教意识中，“身份”是某种形而上的东西，现在它日益变成只是一个“公司标识”，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符号。实在本身只成了一种结果，一种在符号活动中唤起并由符号活动所唤起的東西。戏剧与纪录片、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人们每日对传媒产品的吸收开始取代他们在生活中的祷告。

回想起来，我发现在十几岁时我一度许多星期与传媒根本没有联系，这是很奇怪的。那时许多人每天与上帝以及上帝的圣灵的运行保持联系，正像现在人们通过传媒与时代精神保持联系。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昂伯托·埃科（Umberto Eco）早已提出，在现代由传媒领导的文化中，我们事实上有一个向中世纪的回归：过去是教会为每一个头脑提供一个想象的世界；现在传媒做这工作，名人就是新的圣人。

第三，新科学和新技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快速发展：标准模式的物理宇宙学、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火箭与人造卫星、医学和护理业。三四十年之后，一个单一的全球技术文明就迅速崛起。从这一文明的观点看，宗教日益像一个累赘，一个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幸存者：在面对被吸收到包容一切的匿名的新全球文化的威胁时，它以一种地方性的和传统的方式象征、扮演和充满斗争性地断言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种族身份。宗教似乎到处设防，进行一场最终失败的后卫战斗。

现在似乎很明显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的宗教新保守主义好景不长。60 年代，它被迅速扫除了。上帝的意识以及与如脐带一般与上帝密切相连的意识怎么最近都这么真实，然后又如此彻

底地消失了呢?

这个难题不只是基督徒的。在南亚和东亚新兴的后现代城市里,传统的破坏是惊人的——全都没有任何明显的抵制和遗憾,而且在几十年间就发生了。这也许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剧烈、最突然的文化断裂了。

新的全球技术文化带来的是一种非常自然主义的气质。世界就像一个通信网络,事事都是开放的、公共的、可进入的,并且全都在一个层次上。没有什么是深层的,没有什么可以长时间隐蔽起来。没有安全的隐私,无论在一个人的灵魂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符号的世界是一个流动的、单层的连续体,没有外部和秘密的地方。

然而,人们确实声称在这些陌生的新条件下有可能保住我们传统信仰和价值观中的某些东西。他们向我们保证,宗教在以下情况下能够生存或者确实活下来:其一,宗教作为价值观;其二,宗教在私人领域或者在家庭里;其三,宗教在个人主观性内;其四,最后一招,宗教作为一种反文化。

这四种回答的共同之处,就是相信生活的某个领域能够得到防护并保持不受伤害,可以避免后现代的腐蚀性影响。这一假定就是我们至少在世界本身和应该所是的世界——或者或许在公共与私人、客观性与主观性、主流文化与反文化——之间可以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但是,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状况恰恰是因为这些区分的消除而确立的。公共领域,即意义之海,是无外在性的和无止境的:没有东西是被固定的;事事都是一起运动和变化的。它使每件事都卷入,包括价值观、私人生活、自我和反文化。我们决不可能把一小部分意义(绝对之物、确定性或者基本原则)分离开来并使其保持不变。相反,正像长长的宗教秘传史充分表明的,一切保持不受挑战的和在公共观点之外的意义和真

理都迅速蜕变为单纯的胡说。要有意义，语言必须自由流传。

四个回答中的第一个，即宗教能够作为价值观生存下去，这尤其和那些右翼政治家有关，他们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是自由贸易、废除外汇管制等最强烈的促进者。因为他们不愿被公开视为拿我们的道德和宗教冒险，让它们就像我们的经济价值观一样在全球市场上漂浮，所以他们试图为结合了社会与道德保守主义的极端经济自由化辩护。经济价值观应该是由并只由开放市场决定其所是的东西，但是道德价值观据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从传统接受来的东西并保持不变。在美国，政治家们谈到家庭价值观或者美国方式；在新加坡，他们谈到亚洲价值观；在英国，他们谈到维多利亚价值观——当然，这样的谈论对于上述价值观的实际命运无济于事。道德价值观在我们日常的公共的交往中生存，很像经济价值观，并和它们一道盛行或者衰落。如果右翼人士拒绝承认现在一切都开始漂浮在全球自由市场上——不仅金钱和价格如此，而且语言的意义、宗教的真理、道德和美学价值观都如此，那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第二个回答，即宗教能够在私人领域或者家庭里生存下去，这或许和正统犹太人长期幸存的范例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太强调这个例子，这部分是因为犹太人在长期被排斥在基督教世界之外时，他们自己认识到保持其传统富有活力的惟一方式是保持他们的语言，方法是变得极其爱好书籍、健谈、理智，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后现代剧烈得多的压力之下，正统人士自由直率地承认，他们如其他宗教群体一样面临被吸收而消失的威胁。过去帮助他们生存下来的特殊品质不再充分了。

第三个回答，即宗教能够在个人主观性领域作为个人信仰而生存下去，这尤其植根于路德和克尔凯郭尔，以及植根于现代基督教存在主义者如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对福音

神话化的阐发。路德区分了被相信的信仰(*fides quae creditur*)和借此去相信的信仰(*fides qua creditur*)。克尔凯郭尔异常清楚地发展了这一观念,说原则上被相信的“什么”完全能够分解成为“如何”相信[例如在《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年)中最后几页]。如果把做基督徒变成就是成为一个怎样的自我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那么提及所相信的客观内容就没有必要。它会消失,不再需要。

更晚近的时候,鲁道夫·布尔特曼类似地将基督教福音去神话化,使之成为基督教存在主义的形式。在1980—1984年,我提出同一观念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基督教非实在论”(这一理论认为宗教信仰不应该被理解为陈述超自然事实,因为它们的真正功能仅仅是产生一种生活方式)。它面临两个难题:它甚至对普通人来说都有困难,所以对教会领袖们来说完全不可能。到1984—1985年我开始明白,人类自我不再能够忍受这一理论放在它身上的重负。我们所有的思考都依赖于语言。但是,语言是在我们公共生活的往复中形成的,词就在这过程中获得其意义。内在的思想世界不可能是每件事的起始之地。在我头脑里发生的绝不是最初的或者最终的,并且不是封闭的。在整个文化流中,我只是将其中的一丁点私有化,而且带有地方性,这是完全偶然的,第二手的。我们所有人都比我们在教导下自认为的自己要轻得多。一代人之前,肯定自我还被看做艰难的任务,并成为深层的本体论焦虑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学会听任更加偶然的事情,学会更加巧妙的空谈,更加无忧无虑。

第四个回答,即宗教和永恒的价值观能够以反文化的方式生存下去,它尤其与各种新时代膜拜组织、原教旨主义、克里斯玛式的基督教以及其他一些运动联系在一起,它们都试图反抗和避开西方文化已经形成的东西。但不用说,所有这些运动都要失

败，不管它们是由加利福尼亚的先知还是由教皇、阿亚图拉领导。在将文化视为活动的符号系统这一新的理解中，我们所居住的象征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无外在性的和不稳定的漂浮的连续体。反对它的所有反应都必须使用它的词汇，因而也是它的一部分，并将为其所吞没。你不能真正退出。没有地方可退。你对这文化系统的抗议仍然是这系统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超自然主义的幻觉是相信我们通过撤退到某种隔离的、有特权的领域就能找到拯救个人灵性、地方性词汇、族群、传统的确定性。这样一种撤退在过去确实十分常见，但现在其结果都是有害的。文化的、民族的和宗教的身份过去是出于差异性——划分与排斥——而被建构的。每一个我们总是把自身等同于不像他们。费拉德尔非亚（Philadelphia^①）曾经一直建立在对外人无端仇视的基础上，例如，犹太人通过与外邦人隔离来界定自己，基督徒同样与犹太人隔离，穆斯林与基督徒隔离，长期隔离的后果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对自我认同越清楚，就越把自我视为被敌人所包围。与你的同类在一起是你的本能和责任。大约从黑格尔时代起，每一次对群体感和群体身份的重新确认都始终伴随着对外人的强烈敌意。你越有身份，你就越有民族优越感，而对外人越缺乏爱。你越正统，就越会发展出一种受害心理学。

为了避免这一危险，我将要提出：如果我们不能击败后现代性，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它。我对宗教重新提出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定义，它（采用基督教词汇来说）让宗教更加接近天国而不是教会，更加接近登山宝训而不是任何一种正统神学，它使宗教在观点上表现为短期主义。与20世纪60年代的世俗神学不同，它要将宗教“美学化”，也即以艺术实践和象征表达来看宗教生

① Philadelphia 字面意义是兄弟般的爱——译者注。

活。按照新的定义,宗教生活是一种表现的、建构世界的活动,通过这一活动我们就能聚集在一起,并找到某种死后的或者怀旧的幸福。

同时,词典仍然用超自然信念定义宗教。人们将要抗议说,历史上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封闭在巫术的和宗教的思想方式和世界图像中。人们一直相信有许多种看不见的超自然存在物和力量,相信天堂和地狱,相信诸神、精灵和已故的灵魂。如果我完全抛弃这一切却仍然保留宗教一词,那么我就有许多解释工作要做。我们为什么必须走过这条路?在我们可以获得这一简单明白的真理之前,为什么必须艰难地经历几千年超自然信念和神话思维?为什么人类的教育走了这样一条古怪的和迂回的道路?

这一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工作议程。我们需要关于我们自己宗教史的哲学,它将帮助我们与我们的过去达成妥协并从它的专制中解放出来。我们尤其需要知道:

首先,诸神为什么而来?为什么所有地方的人都认为他们为一个看不见的充满超自然影响力、精灵和诸神的世界所包围?这一信念的要点是什么?仅仅把它作为单纯的错误或者迷信而放弃它,这似乎完全是错误的。(如维特根斯坦在另一文本中曾经说过的:“由于一个错误,那错误就太大了。”)关于诸神向我们教导了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没有以其他方式来学习,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迄今已给出的更好的解释。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诸神衰退理论。如果我们最初从诸神那里获得我们所有有关一贯的固定的事物秩序、宇宙、版图、君权、法律、土地所有权、价值、自我、命运等的观念(我将要论证的),那么诸神如何以及为什么最终丢了饭碗并开始远离我们了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提出了一种新的有关宗教实践与宗教

对象的语言理论。简单地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如哲学和宗教在过去所教导的，确实有一个看不见的超感觉的世界或者说精灵世界，它在我们周围，也在我们之内。

第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就是词和象征的世界。

第三，整个超自然的宗教世界是对语言世界的神话再现。

第四，通过宗教实践，社会向它自身再现并肯定其语言构造它的世界的不同方式。

这一观念是这样的：如果我能够说服你接受我对过去宗教的解释，那么你就不会对我关于未来宗教的提议显得十分愤慨了。

※ ※ ※ ※

现在全世界的学童都在学习几乎一样的课程：英语、数学、科学和技术。运输、通信、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甚至新闻和娱乐都几乎完全全球化了。无论哪里，城市都有几乎同样的社会事业机构——银行、医院、发电站、广播电台、大学、高层办公楼——全都使用几乎一样的技能，全都建立在几乎一样的知识之上。一个单一的、连续的世界文化在迅速地巩固它自身。

这一新的世界文化是世俗的并且日益跨民族化。在这一文化中，我们只有从那些对正在发生的改变最惧怕并极力试图加以抵制的人那里听到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语言。他们惧怕遗忘，因为他们怀疑一切——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信念和价值观、他们的身份——不久将消失，无人惋惜，完全被忘记。他们希望肯定和延长他们独特的身份，他们大肆宣扬，紧密团结，并且采取一种永久设防的态度。然而，他们能坚持多久？在印度次大陆，印度教徒在斯里兰卡可以同佛教徒斗争，在西北部可以同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斗争。但是，在两地之间的广大地区，印度正在迅速步入现代化，并且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那时市场要求和平和稳定的声

音会大过旧神要求战争的声音。

奇怪的是,神和玛门^①在伦理上应该改变位置。玛门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要人们健康和得到良好的教育。他要和平与稳定、进步和普遍的繁荣。相比之下,神(尤其在中东)已经成了要求无知、贫困和战争的摩洛克神。《启示录》中的四个骑手对人类可能造成不幸,但是对神却是很好的。

是否会有、究竟能否有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宗教,不把人类分成一个我们(we)和一个他们(they),而是表达一种新兴的集体意识,即将全人类与我们的共同世界统一起来?

一二个世纪前,人们依然认为这是可能的。西方不同的思想家自从莱布尼茨起就已经对亚洲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团结有很深的印象,从叔本华开始许多人也对印度和西方哲学史之间的相似有很深的印象。霍金(W.E.Hocking)、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阿诺德·汤因比这代人中,还有人期望人类在诸如永恒哲学之类的保护之下达成宗教统一。

这种态度现在已经被放弃了。霍金著名的报告《重新思考宣教》(1932年),提倡对亚洲诸传统采取(近似)调和的方法,受到亨德里克·克雷默(Hendrik Kraemer)的尖锐反驳。更一般地说,所有宗教后来都选择了区别和分离而不是调和之道。更重要的是,随着形而上学实在论和道德实在论的终结,后现代世界已经相当显著地变成后哲学的了。因为有了任何普遍被理解的哲学词汇,人类的诸传统宗教现在只能作为原教旨主义——就是它们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的东西——生存下去。

我们其余的人要跟随的似乎是彻底宽容的多元论。如果确实没有一个外在的大真理可以充当未来全世界范围的人类共同宗教

^① 玛门意即钱财——译者注。

经验的基础，也确实没有一个真正的道德在外面，那么或许尼采是对的，我们的真理确实只不过是“那些我们没有它们就不能生活的幻觉”。对任何人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就是给那人以力量、信心和活力的东西，并且可能这样的主观真理要有多少就有多少。假使这样的话，一个人确实应该很高兴看到3 000个左右的新宗教运动、1 000个左右的新时代群体、数百个主要信仰的教派都在今日西方国家繁荣、涌现。如果他们的信仰结果对他们好的，那么他们的信仰对他们也是真实的；既然外面没有独立的真理（truth），既然我们所有人都完全自由地，以在我们看来最佳的方式构造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没有根据称其他人的世界是无理性的。旧的反映型的理性在于人的心灵和外的事物存在的方式相一致，它现在死了。没有现成的或者先行固定的事物存在方式。肯定地，这世界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解释上富有弹性，足以让非常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视角奏效，令它们各自的追随者感到幸福。所以，它们为什么不应该和平共存，就如非常不同的现代艺术作品在艺术画廊里共存？

加利福尼亚的（也是非常富有加利福尼亚特色的）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 1975）以同样的论调论证了他所称的一种“知识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这里的知识意指，确实意指科学知识。哲学家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事先规定什么将被允许视为真正的科学方法，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划在哪里，以及别的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任何试图事先规定规则的做法都只会招致越界——就如人人知道的在艺术中的情况，但在宗教（根据费耶阿本德）甚至在科学中，情况也一样。历史上不是有许多极其著名的蠢人试图把物种变异理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当作反直觉的科学理论，事先予以排除吗？

我在本书犯了同样的错误？依据我自己反实在论的假定，未

来肯定不得不越来越变成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定形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否表明我已经试图先验地描述一个未来世界信仰的轮廓?我们没有客观的理由,因为现代艺术花样繁多、数量过多而感到痛苦,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介入和试图对它强加法则和秩序;同样,我们肯定没有客观的理由,因为现代宗教表达的杂多而感到痛苦,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介入和试图强加理智秩序。为什么不应该有无政府状态?

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我论述如下。

首先,我们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从5 000年—7 000年的农业文明中浮现出来。在这一很长的时期内,人类的生活是基于一种共同的宇宙秩序观,人类的行为受来自无限强大的神圣中心的律法的指导。我们习惯于为我们安排好道德秩序和种种价值观:一切都已经有充分的根据,都是熟悉的,而生活有着牢固的基础和指导。现在我们突然失去所有这一切,我们感到完全迷失了方向,自由漂浮。

其次,至少在过渡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保持一些我们以前惯常的宗教实践和态度是有益的。我已经使用“上帝的目光”一词,表示以非实在论的方式延续看待我们自己和生活的古老习惯,仿佛用上帝的目光在看。好像在上帝面前生活的旧方式曾颇有价值地提升了人的意识和保持了道德上的稳定,现在一个人可以继续有效地向上帝祈祷,就如一个人可以发现自己经常想到一个死者并与他谈话。我已经使用“极乐的空”一语来表示像佛教徒的禅定或者基督徒的默观祈祷那样的一种实践。我们在静默中,等待在焦虑的驱动下的语言冲击减缓下来,直至我们完全放松。世界解开它自身。我们进入一种空的极乐的狀態。这是上帝吗?这是绝对的虚无吗?这是死亡吗?这不要紧。什么也不重要。

再次，在从默观转向积极的生活时，我已经使用“太阳式的生活”一语描述了一种自我输出、自我流出、自我发射的表现主义伦理。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或者害怕放弃自我。我们不计后果地将自己倾注到符号表达中，然后传给他人，再传给他人，最后消失，对此毫不后悔。

我已经增加了第四个主题，即诗性神学，意即我们应该把自己视为得到全权委任，以新的方式重述旧的故事。在相继的几代人中，由于社会价值观已经改变，好莱坞好几次重塑了西方神话，注入了新的价值观。实际上，每个艺术类型都是一个经历不断修改的神话，并且我们不应该谴责说那是亵渎，而应该支持那些以类似的方式重塑耶稣故事的作家和电影导演。究竟为什么不可以呢？没有亵渎这样的事情。

第五个主题即世界宗教是最困难的。我通过论证以下几点为它准备了道路：一是，未来的哲学将是完全自然主义的或者此世的；二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最后必须摆脱所有那些旧的思维方式，它们建构宗教的方式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将我们和他们分开，将圣洁者和不洁的、受排斥的他者分开；三是，既然我们不能进入任何完全独立的世界秩序和道德秩序，我们就应该放弃旧的教条实在论并代之以采纳一种表现主义的或者“唯美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活观。

虽然要点是清楚的，但是要承认我们创造了一切依然出奇地困难。我们发展了整个大纲。我们慢慢地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语言、价值观、知识体系、宗教和世界观。我们甚至发展了我们自己的主体意识，因为意识经验的照亮、意识性是语言的一种副产品。

注意你自己现在的视觉领域。在你面前所看到的每一丁点儿都是由文化和语言构造和形成的；是由文化范畴构造的，是根据

种种理论才被领会的,是由词形成的,是受我们的情感和评价影响的。我们的世界是我们自己的自我客观化。

我们在自己的周围看到我们自己历史的积累产物,也即“客观性”。语言反映了这一点。例如,France(法兰西)一词既是民族和国土的名字,又是文化传统也就是社会世界的名字,这个世界就是那民族在他们自己周围建立的世界。一个人的祖国、她的家、她的家庭、她的作品、她的世界,是她的“客观性”,是她与他人相关的自我表现的生活活动积累的产物。只要我的世界、我的客观性是美丽的,我就高兴倾注我的生命并献身于它;只要它是丑恶的、非正义的、要被剥夺的,它就是对我和我的生活的一种判决,我必须努力改进它。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宗教可能是怎么样的。它来自新的后康德主义的、后浪漫主义的自我观,这个自我不是一个为了永恒而净化自身的灵性实体,而是一个太阳式的进程,在它的世界里将自身倾注到符号表达中。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把你的视觉领域视为你自己的艺术作品,你将理解这一点。让人吃惊的是,环境伦理学和后现代灵性最终证明是一致的。我们的灵性生活、我们对救赎的追求、我们建构世界的活动,全都证明是同一回事情。在心理学和宇宙论之间、在我们的内在性和客观性之间、在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确实有一种密切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我们想要宗教成为具有统一作用的表现活动,通过这一活动我们可以同时让我们自己处在一起和建构我们共同的世界。但是,不提及短期的难题——我们同时做什么——就结束,这可能是错误的。

直至相当晚近,人类的世界被划分为六个主要的文化区域,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确立已久的宗教词汇。现在文化突然间变成完全全球化了;但我们还没有任何全球性的宗教词汇。在发展出

这种词汇之前，个别的宗教人士如何应付呢？

从短期的观点看，最好是继续实践一个人自己地方性的和传统的信仰，但这种实践基于严格的非实在论或者一贯的去神话化。因而，信仰之海的许多成员相信以一种非实在论的方式理解基督教，观点大致如下：

其一，上帝是一个“宗教理想”——即代表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宗教生活目标的统一性象征。

其二，基督徒的上帝是爱——即基督教对宗教理想的具体说明是把仁爱——无私的或者“太阳式的爱”——作为最高价值。

其三，我们认为爱在耶稣里——在他讲的故事和关于他的故事中，以及在随后围绕他发展出的各种不同的教义和其他故事中——采取了人的形式。

最低纲领主义的基督教神学来自伟大的德国康德和利策尔主义者的新教传统。它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们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做基督徒（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而不必宣信任何不真实或者不合理的信念。

其他信仰也能够并且正在以类似的过渡性的方式被实践。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毫不拖延地开始发展一种新的世界信仰。

我最近提供的解释，把一种新世界宗教的哲学核心描述为，一种感受和实践我们自己与我们共同经验的世界之关系的新方式：

通过你的眼睛空掉你自己，倒到全世界，就如画家一样。感受世界——能量如何源源涌出支持着你，语言又如何从你这里流出，进而形成、组织、知觉和润色你的经验世界。一刻复一刻，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活动中，

世界不断倾倒出来。^①

一个明显的困难出现了。不仅这一全新的宗教类型难以解释,而且可能会发现即使是密友和同盟也不能承认它是宗教。

面对这一难题,人们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种全新的宗教建构或者概念化能有望被理解,直到旧的信仰比它现在更进一步地衰落。但是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快行动。除非迅速抛出某种新的东西,否则当后现代化进程已经走得太远,并且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一切就会为时太晚。

^① Don Cupitt, *Solar Ethics*, London: SCM Press, 1995, p.19.